

■ 新作锐评

钩沉史海掣“鲸鱼”

——评滕非新作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

□ 杨不寒

作家滕非是一个长期有志于传记文学的作家，对宋代历史亦有深入的沉潜钻研。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是他继《庙堂与江湖：范仲淹传》之后，最新推出的长篇人物传记。与前作传主范仲淹一样，包拯同为北宋重臣，亦是已成文化符号的历史名人，星辰河岳般站立在不朽者的行列。相对而言，人们关于包拯的想象掺杂了更多的演绎成分。在一般性的认知或想象中，包拯是一副青天大老爷的形象，稳坐开封府衙。他断案如神，铁面无私，并且这张铁面有着黝黑的色泽。这样的形象虽则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历史文化想象，却与史实存在着一定出入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，鲁迅所谓“民族脊梁”般的为民请命者，包拯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实在有必要得到系统的考镜，以免其像鲸鱼入海，在历史滚滚的波涛中被隐去真实面目。滕非这部新作充分显示出在史海中钩沉这条“巨鲸”的抱负。经过《庙堂与江湖：范仲淹传》一书的有效实践，在对相关材料的占有、对北宋社会历史的熟悉，以及对传记文学写作理路的把握等方面，滕非都有了更为深厚的积淀与经验。整部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显得翔实细致、繁简有度，并且笔调从容，畅然可读。

《宋史》中的《包拯传》仅500余字，包拯的生平散落在各种奏折、方志、家谱、野史、散文及随笔中。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广泛搜集、甄别了这些文献材料，并以熨帖的想象、同情的理解补充还原了诸多社会的、生活的、心理的细节，力图完整而生动地勾勒出包拯的一生，再现一个面目清晰的包拯形象。

纵观全书，在按时间顺序为包拯作传的基础上，作者还以事件、主题以及人物等不同的分类方式，叙述包拯的仕途经历与政治作为。我们试以作者对仁宗皇祐二年至皇祐四

年包拯知谏院这一经历的书写为例，来略做分析。据作者统计，知谏院期间，包拯一共向朝廷递交奏议73折次，其中最重磅的是对大臣的弹劾。在这一部分，作者以被弹劾人物的重量级别，以人物为单位来分节讲述他们与包拯之间的故事。除此之外，包拯的奏议还涉及很多其他内容，作者没有流水账一般地转抄那些奏章，而是依照这些奏议所涉及问题之不同，将其分为五类，依次为“关于天文、自然灾害与国家命运的见解”“论朝政和人事”“论大臣操守职责”“议论时政”“论水利”。这样不但层次分明地说明了传主所关心的问题，鲜明地展现出传主的精神面貌，同时也让行文显得自由不拘而富有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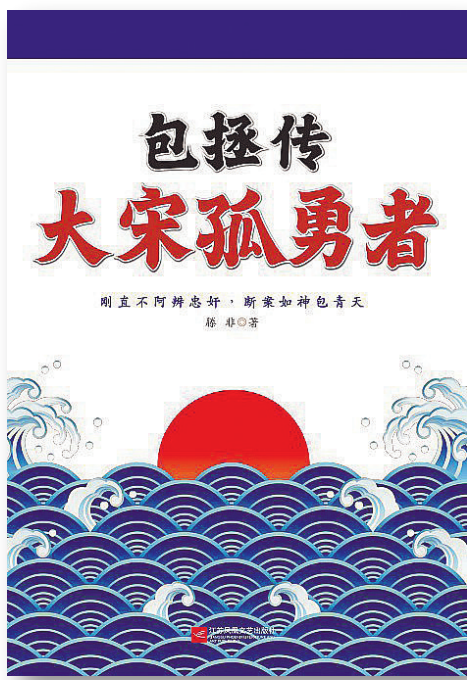
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对包拯形象的还原——毋宁说是塑造，也比较成功。历史本身就处于我们的叙述之中，而所有的叙述都具有倾向性与虚构性。在滕非的书写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对大宋的民生吏治、早涝饥馑、官员履职情形、军队驻防状况等问题的持续关注 and 费心费力，构成了包拯仕途人生的底色。同时，作者也指出：“包拯是一个深谙百姓疾苦、洞悉官场潜规则的人。”他固然刚直犀利、疾恶如仇，但也并非是非毫无人情和计谋的莽夫。对“官场潜规则”的洞悉，并不说明包拯是一个世俗甚至庸俗之徒，反而是他智慧的一种表现。而所谓“知世故而不世故”的秉性，洞悉潜规则而不潜规则的坚守，更有力也更真实地刻画出一个完整而高贵的灵魂。

当然，“不虛美，不隱惡”一直是著史的基本伦理，此伦理同样也适用于传记文学。在对包拯的形象塑造中，滕非毫不避讳地引用了欧阳修等人对包拯“学问不深，思虑不熟，而处之乖当，其人亦可惜也”之类的保守评价。虽然作者对此引而不论，但也足以把读者带

回包拯担任谏官时的历史现场中，一窥时人眼中的包拯，了解到包拯其人与北宋朝堂的复杂性。

尽管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一书主要关注的是传主的仕途生涯，但对一部传记文学来讲，仅仅书写传主的政治作为是不够的，那会让人物缺乏烟火气息和血肉温度。因此，书中还介绍了包拯的成长环境、感情经历以及家庭情况。像《朝堂重臣》一章中，“真正让他难过的是自己年老无后。儿子死了，唯一的孙子也死了。每当想起这些，包拯就难过得一句话都不想说”这样的句子，显然有虚构的成分，但因为作者在想象的基础上，对古人寄予了一种同情，我们也就不觉得这样的细节失真。事实上，唯有在这种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，传记文学的书写才会显得活泼而真实，并且动人性情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对包拯真实形象的努力钩沉，并不是为了推翻甚至否定传奇小说中的“包青天”想象。滕非兼具小说家的身份，在《少年底色》一章中，谈到古代野史稗说对包拯形象的塑造时，他就站在小说家本位径直指出：“宋代文化产业比较繁荣，随着各类笔记小说的出现，人们对当时的物产、风貌等社会现象有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和见解。尤其记载名人的轶事典故，更是言简意赅又文思隽永，因此也广为后世流传。这类类似《世说新语》的笔记小说比起正史，往往更能把当时一些重大人物和历史事件记录下来，丰富精彩。”有鉴于此，滕非在行文中大量征引有关包拯的传奇小说、民间逸闻以及影视作品，将之与信史记载相互作证。当我们尽可能地逼近历史真实，再回头去看关于包拯的那些文学艺术书写，恐怕会另有一番感想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约略能从滕非的写作中，看见现实是如何被转化为文学的某些规律现象；而这些规律现



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，滕非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11月

象中，又进一步揭示出我们民族历史文化想象的心理图式。

正如美国叙事学家罗伯特·斯科尔斯在《叙事的本质》中指出的那样：“对于同一个人物，我们既可以关注其个体化的特征，亦可以将其视为某一宏观体系的组成部分。”在滕非的叙述中，包拯既是正直官吏中的一员，也是通过奋斗实现人生目标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，更是在世俗洪流中坚守自我的一员。当然，他也是带着一腔孤勇，固执地越过重山后，重新理解人生的一页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这一坚韧、伟大而又孤独的灵魂，都值得我们在今天重新去钩沉、检视与体悟。在历史这一面古老的镜子之前，《包拯传：大宋孤勇者》既包含了社会政治方面的教益，也蕴含了深远的人生启迪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一部传记文学显现出这些素质和向度时，它才能获得其存在意义及流传价值。

（作者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）

■ 书斋札记

展现海南热土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

——读杨海蒂散文集《这方热土》
□ 尹小华

杨海蒂的散文集《这方热土》（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），以优美的文字表现了真实生活、真实情感、真实思索，抒发了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，犹如乘风破浪的语言之舟，将我们载到海南热带雨林，让我们听到雨林深处悠扬的歌声，饱览峡谷两岸原始雨林景观，感受到山海之间的万千气象，以及这方热土展现出的自然之美、生态之美和人文之美。

《这方热土》是沉思者的文学，更是行动者的文学。20多年前，杨海蒂在报社当记者，兼任海南省歌舞团报幕员，经常随团“送文化下乡”。行走让她听到、看到，让她感悟、收获。如果说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一部雄浑的交响曲，那么山海相连的尖峰岭，则是举足轻重的第一乐章，是辽阔深邃的奏鸣序曲。当命运之神将杨海蒂召唤到海南岛，她就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尖峰岭，像欢快的蜜蜂飞往鲜花盛开的旷野，尽情领略以民族特色为文化符号的民族村、以海洋特色为文化符号的新渔村、以热带雨林为文化符号的生态村，还有江河湖海的热带田园风光，犹如一幅幅迷人的美丽画卷。“黎母山是海南岛绵延最长的一组山地，沿着完整山脉的轴线伸展，远处还有无数连绵起伏的山脉，浩瀚的林海莽莽苍苍，无边无际，让我的视角和心灵都受到震撼。”（《黎母山》）“走进五指山国家自然保护区，就像走进了大自然博物馆，走进了交响乐的殿堂。”（《五指山》）“崎岖的山路、茂密的森林、美丽的河流、纯朴的村民，共同将高峰村建成一方世外桃源。”（《鹦哥岭》）“田园如此丰茂，村舍如此恬静，屋前舍后山花烂漫，瓜果遍地，鸡鸣成群，童子嬉戏，洪水村山川、风物、人情都如此美好，真想留下来当一名村妇。”（《霸王岭》）

这些唯美的篇章是沾着泥土、带着露珠、冒着热气的躬身体验，如同听到亲人的呢喃细语。站着走着，文章才能立起来；亲手触摸，作品才有温度；深入现实生活，对题材进行挖掘，再进行艺术加工，才能还原生活的真实，获得真诚的认同。杨海蒂观察、聆听、体验、思索、感悟，把海南大地和人民写成了诗情洋溢的美妙风景。她将真情隐匿于平静的叙述之中，把抒情像种子那样埋于地下，让我们从中感受到那即将破土而出的生命热度和神奇力量。

杨海蒂的散文是美丽的，其中的美丽风景因为她的妙笔生花，信手拈来即是美丽华章。“山与海的缠绵，阳光与海水的合力，造就出一道独特的风景——银光闪闪的盐田”；“随着第一缕阳光跃过地平线，万物迎接看朝阳，壮阔的海面碧波荡漾，散发着迷人的光芒，山海之间气象万千。我唯有梭罗那般的切身感受——‘整个身体只有一种感觉，每一个毛孔都汲取着快乐’。”（《尖峰岭》）“阳光透过枝桠照射进来，让整个空间生动起来。微风穿过林间，树木暗中兴奋，树脂从大树上滴落，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芳香。”还因为作者想象独特，总能别出心裁，《霸王岭》写道：“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想起阿尔卑斯山谷中那块著名的标语牌——‘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’真想对司机大喊一声——慢慢走，欣赏啊！”温情的文字如潺潺流淌的小溪，在情感的森林里蜿蜒、伸展、不喧嚣、不炫耀，却在波澜不惊的叙事中，显出无穷的趣味、润泽的力量和精神的光芒。

杨海蒂的散文写给海南雨林和自然生态，也写给她自己。在她生命的诗意旅程中，自然与她的心灵早已融为一体。这些散文既有宏大视野，又具体描写山川雨林、名胜古迹及万物生灵，有很强的代入感。“简易的舞台早已搭好，台下坐满了身着民族服装的观众，妇女衣裙花色图案多是山川树木花鸟鱼虫，她们把大自然穿到了身上。”（《霸王岭》）“海南岛有‘南药之库’之称，可入药植物约2000种，达全国药材的40%。我们在尖峰岭雨林中行走，触手可及的‘野草’竟然大多是草药。”（《尖峰岭》）“五指山野菜是海南最著名的野菜，以其毫无污染的品质、清脆嫩滑的口感拔得头筹，它曾是琼崖纵队战士的家常菜，故而得名‘革命菜’。”（《五指山》）

杨海蒂的散文多是对于大自然和人间众生的诗性凝视和钟情心语，捕捉天籟，刷新认知，使自我境界得以升华。如：“登高临远俯瞰仙安石林，那些被暴雨冲击出的裂痕，那些被时光雕刻出的沟壑，突然间把我的心揪住了……我仿佛走进了宇宙另一个时空，心头涌上地老天荒之感，宛若回到了无限久远的过去，又仿佛走进了无限遥远的未来。”（《七仙岭》）又如，当作者在黎母山感受到江河带来水源，也给万物带来生机的时候，立即联想到缪尔的“森林是河流的源泉，也是生命的源泉”，黎母山正是这句话的注脚。再如，“城里未曾有过的这宁静安逸，让我感受到全身心的放松，我静静地仰望苍穹，凝视天空中闪闪烁烁的星辰，体味着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心声：‘世上最美的东西，是天上的星光和人心深处的真实。’”（《尖峰岭》）

78年前，被称为“黎头”的黎族领袖王国兴，领导黎、苗族同胞发动白沙起义，在黎母山区坚持最后的游击战争，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，谱写出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的辉煌篇章，琼中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革命根据地。作者在《黎母山》中巧妙地将个人与群体、民族与国家等诸多命题，或浅或深、或隐或显地统一在文章里，旨在赓续传统文化、培植民族气节、传递国家情怀、启迪和引导现实人生，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。

杨海蒂是位勤劳的作家，一路撒下种子，一路收获果实。我们从这部散文集中，看到了杨海蒂眼中大半属于她的情感、思考、追忆和感怀，这也是作家的真情流露和家国情怀。（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副主席）

■ 新作快评

凝固在旧时光里的记忆与乡愁

——读黄孝纪的散文集《老家什》
□ 李 钊

遮雨的蓑衣、支锅的撑架、装水的瓜勺……曾在乡村触手可及的老家什，蹉过岁月的河流，带着淡淡的惆怅，在我们的视线里逐渐远离，凝固岁月的老家什里，唯余被生活烟尘覆盖甚至掩埋的爱和温暖，以及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《老家什》是作家黄孝纪献给故乡八公分村的又一部记忆之书。他在乡村成长，后在城市安居乐业，每当老家什撩拨旧日时光里的乡愁，他便会带着“家”的记忆，去换了模样的故乡走一走，回忆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。记忆泛起时间的涟漪，盘旋于心头的旧时记忆诉诸笔端，凝结成了被爱和温暖填满的文字，随着情感的跌落、延展、升腾和激荡，记忆和乡愁凝固在旧时光里，留与后人翻阅和追忆。

一件老家什就是一段历史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。它们用默默无言的方式，忠实记录着艰辛不易的农耕岁月，留存下一段渐行渐远的民俗风情，细细擦亮我们逐渐模糊的记忆。《锄头》记录的是祖辈用辛勤和汗水耕耘幸福生活的日常，作者回忆与家人顶着烈日和酷暑，挥舞锄头锄田挖地，任双手磨出“红红的大水泡”，汗水和泥水包裹全身，依旧劳作不止。《铁锅》有屋檐下蒸腾的人间烟火味，有朴实生活里养成的勤俭习惯，一口铁锅承包家人的一日三餐，炒、熬、蒸、煮中尽是生活的长短滋味，哪怕烂了洞眼或缝隙，农人也舍不得丢弃，只得待锅的行商吆喝声起，便拎着铁锅去把五味杂陈的生活补充完整。煤油灯是电灯普及之前的主要照明工具，透过《煤油灯》中深深浅浅的文字，隐隐可以看到昏黄的灯火摇曳升起，被照亮的一方家园升腾起温暖的气息，一个山村男童对未来朦胧的向往和期许在“跳动的火焰”中被点燃，在这盏烙上了深深时代印记的灯火下，更能触摸到农耕时代的变迁和生活习惯的演变脉络。

朴实的生活场景、朴素的思想感情、质朴的人生理念，构成了黄孝纪散文写作的主要内容，文中那一份语言与情感共生、文心与人心交融的朴素，常以简单却有力的方式，唤醒我们心中蛰伏已久的旧时记忆，引起灵魂深处的共鸣。老家什里有忘不掉的童年快乐，《瓜勺》里“我们常把瓜勺戴在头上，扮和尚，扮老寿星。笑闹追逐中，被玩伴按着敲，使我心生温暖、嘴角上扬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孩子的玩具大多都是自制的，老家什也能成为手中玩物，每个人都有对快乐童年的记忆。黄孝纪的文字里时常能见到母亲的身影，字里行间充满思念和哀伤，他在《神灯》中回忆了母亲逝去的最后时光——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始终牵挂着儿女，“拿出我买的药品给前来看望她的村邻看，说这些药要5元钱一粒，贵，是我孝纪买来的”，令人泪目。母亲的生命之火已熄灭，黄孝纪在心中为母亲点亮了一盏“不灭的神灯”。如黄孝纪在《朝门》中所言，“这是一个奇怪又庄严的地方”，寻常日子里是村里人闲谈玩耍的所在，而在婚嫁娶等特殊日子里，朝门会立马显出庄严的一面，哪怕朝门已消失在历史尘烟中，却一直矗立在村民和游子的心中，传承着共有的情怀和信仰。

《老家什》里记录的那些远逝的农耕岁月的生活片段，会让我们追忆往昔、怅然若失，也会让我们泪流满面。当记忆和乡愁在日月流光中发酵，终会酿成一个民族、一个时代无法抹去的沧桑记忆。（作者系评论家）



《老家什》，黄孝纪著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23年1月

何谓“别样的生活”

——读杜梨《春祺夏安》

□ 程远图



《春祺夏安》，杜梨著，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5月

《春祺夏安》是青年作家杜梨的首部散文集。在这本书里，“冬宫”（颐和园）工作经历的人和事、“核三代”家史和成长经历，以及诸多丰富又独特的际遇，都成为杜梨书写的对象。初读《春祺夏安》，作家的别样经历与人生体验，常常使我想到那句源自兰波、后因昆德拉引用而广为流传的“生活在别处”，促使我产生了一种对“他者的生活”的怀想。事实上，我们总是对别样的生活心向往之，并且愿意以此作为参照，来观照自己的生命经验和人生选择。

对于更多人来说，“冬宫”的价值既在于它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，也在于它与现代生活在风格和气质上的殊异。正是这种殊异，它被赋予了更多审美属性。作为与现代城市空间差异鲜明的古典和自然的空间，“冬宫”轻易就能引起我们对古典情调的美学想象。尤其是身在“现代性的焦虑”中，那些有着历史纵深感和文化底蕴，同时又与现代社会气质迥异的地方，或许更容易成为我们想象中“他者的生活”。杜梨在书中多篇文字写到幽暗的“香香阁”的冷，其特殊意味在于，提供了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少有的陌生体验和感官体验，也成为一种感受“别样的生活”的路径。

如果只有这些，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就过于浮光掠影，对于“他者的生活”的理解和想象就会流于浅表。杜梨所写的“冬宫”当然是一片具有前现代意蕴的审美空间，同时更是一个深度内在于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空间场域。杜梨在写作中呈现了“别样的生活”的多个层次：如果说与覆满灰尘的历史相接近、与现代生活相疏离的表象是一个层次的话，那么另一个层次则是这种表面的意趣之外的生活的庸常、琐碎和凌乱。

杜梨还写了“冬宫”里年轻人的际遇。在外面的看来，“冬宫”或许是一片精神休憩、感受古典与自然意蕴的空间，但对于园中的“打工人”来说，审美属性却不足为道。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，有的是名校毕业的高学历人才，有的才华过人，有的有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但他们殊途同归，成为一起在“冬宫”卖票的员工。当代社会的价值观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

个角落，也同样渗透在“冬宫”这片看似和现代生活相距遥远的地方。诸多为了有份稳定工作的年轻人，在体制化的工作中离现实越来越远、离理想越来越远。

年轻人是在“冬宫”真实的生存状态在杜梨笔下显影，成为“他者的生活”更加真实的面向。这个看似“异质”的领域，却与我们此处的生活有着同构的一面，同样是北京这个巨型城市中现代秩序的微观组件，是时代大环境中的一个小小缩影。在某种意义上，“冬宫”在杜梨笔下成为了具有症候性的空间场域：古城北京与当代北京之间隐性的碰撞与交锋在这里被凸显出来。作为古城的北京背负着漫长厚重的历史，而作为当代大都市的北京又被急速发展和扩张的“现代性”人侵和挤压。“冬宫”无疑是北京历史的标志性元素，但当代的制度、生活及当代人思维和行为方式、情感结构又渗透到这里——甚至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对古典和历史的审美情致，同样是作为“当代”的他者建立起来的，用于想象“别样的生活”。身在“冬宫”的杜梨，可以深度感知到它的历史属性和当代性的碰撞和交锋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杜梨的书写呈现了“生活在别处”更复杂的维度，她如此真实、坦诚地记录“别处的生活”的多个层次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既触碰历史又活在当下、既在审美状态中又深深感触现实的痛感状态。

对于杜梨来说，更重要的不是她并不渲染那些表面、景观化的古典情调，而是真诚地对经验进行记录和呈现，即便“北京青年作家”“核三代”“颐和园”等一系列标签成为我们简单理解和想象杜梨生活的符号，但杜梨的写作并没有因此而被简化，她拒绝为符合某种简化的情调而写作，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，呈现个人经历、展露“别处的生活”的复杂和多面面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杜梨的写作在展现“冬宫”审美意蕴和表达当代生活困境的两个维度中来回游走，似乎完成了互相的驳斥和消解：现实感使古典审美被消解，而古典审美又为生活的痛感找到一个温和出口。这些也不禁引人追问，“好的生活”应该是什么样的？

杜梨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她的风格上，她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辨识度。今天文学界的“青年写作”有某种整体性倾向，那就是“向内写作”的盛行与文学技术的经营。青年作家们更钟情于书写幽微的内心，对于自身与广阔世界的深层关联往往很少充分展开，当今时代的图景在诸多青年作家那里往往是缺席的。杜梨是一个充分向外部世界敞开的作者，她切实书写生活，使我们看到“我”和时代的变迁，“我”的际遇和更广阔的“他们”的际遇之间的关联，“我”的个人经验和北京之间的关联。现实感以及对现实世界的敏锐触感，成为杜梨写作的可贵品质。而且，杜梨的文字向来不过度装饰和雕琢，她也不依赖繁复的修辞技术与曲折幽微的叙述技巧，这使得她的写作极具“当下性”，把记忆、现实、情绪、历史、知识融汇到一起，把观照生活、观照自我和观察世界的直觉倾注到写作中，让我们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，触及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体验。（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师）